

◀ (上接 10 版)

这方面,复旦在国内处于领先,优秀的团队、先进的实验室,科研实力又这么强,但他们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潜力。

了解语言的差异和共性,就不能只顾研究自己的语言

文汇报: 语言学的一只脚是生理,另一只脚是社会,这是您的观点。复旦大学的体质人类学呼应了“生理”,而“社会”即文化人类学,您和这个领域的学者互动多吗?

王士元: 不算多,但我很早就喜欢做田野工作。我一直对于声调感兴趣,尤其汉语的声调是一种特色,这是欧美的语言所不具备的。加州离墨西哥很近,在伯克利教书时,有人告诉我,墨西哥有种语言也有声调,还很特别。不同于汉语固定的声调,他们有的音节若具备某个声调,就会让该音节后的下一个音节都要提高半音,我觉得这不是说话,而是唱歌了。我花了好几个星期跑到那个地方去研究语言,还录了音。这就是文化人类学的田野工作。

我很重视中国少数民族的语音。在南开大学,我有一个好朋友叫石锋,他很熟悉国内少数民族的情况。虽然当时我在伯克利工作,但一有机会就来内地,跟着石锋去少数民族地区做研究。然而,每次都要飞越太平洋,这实在是太累了。1997年,香港回归,这让我非常兴奋,心想要不就搬到香港来吧。回来后,我继续跟着北大的、南开的团队去做田野工作。我很关注生理上的语言是怎么一回事,同时我也希望知道,语言在不同的社会、不同的文化有什么样的发展。我一个人的精力无法把这些兼顾着做,但我一直在强调,做语言研究,这两方面都不能忽略。

文汇报: 做了那么多次田野调查,您印象最深的是哪一次经历?

王士元: 我有很多记忆,这

时脑子里想到的是在云南的一次夜行。怒江和澜沧江中间隔了一座很高的山,从一个地方去另一个地方,一定要翻越那座山。某日我们开车赶路,半夜两三点经过时,发现那条泥路上有几块大石头堵着,走不通了。有个同伴知道这是强盗故意设的圈套,待行人下车搬石头,他们就下山来抢东西。当时我们有两部车,车上的人加起来有十几个。那个勇敢的同伴就走到石头前,站在车的灯光下,大声喊道,“干嘛把石头放在这里?我们要把石头推开?”几分钟后,没有动静,我们就一起下车清理路障,然后继续赶路。类似的危险并不常见,但艰苦的条件是一种常态。做田野工作,并不是把车开到某个地方,住酒店,舒舒服服地做事,而是要学会睡露天,没有厕所,自己找地方解决。现在回想起来,这些经历也蛮有趣的。

还有一件事也让我很难忘。一个朋友告诉我,有一种语言叫东干语,很像中国话,不知道是什么来源。我很想去听听看,认识一下那里的人。当时苏联还没有解体,要去的话一定要有签证。申请签证时,问我去苏联干嘛,我一开始很天真,就把自己的想法照实说了出来。签证官听了一脸疑惑:“我们苏联只讲俄语。”被拒签后,我又尝试了几次,最后不得不自称游客,表示想去看看伟大的苏联。签证到手了,但是管得很严,一个导游一直跟着我,而且每天的行程都由他们决定。一路参观下来,终于到了东干语地区。一日,我发现远远走来一个人,长得很像汉人。我马上用俄语打招呼,问他是不是中国人。对方摇摇头,说自己是东干人。我跟他说,我对东干语非常感兴趣,他很客气,答应带我去他的村子。机会难得,我就跟导游摊了牌,无论如何不会再跟着走了。在那个村子,我住了好几天,还参加了一场当地人的婚礼。导游回去告状,说我不合作,但后来也没有追究我。

文汇报: 您在演讲时把香港话作为一个例子,对于一个字,老年人和年轻人的发音出

现了差异,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短期内的语言变化?

王士元: 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的150年,很多内地人来香港,近些年又有菲律宾、印尼的人来打工。香港的语言越多、越杂,香港话就变得越快,和广州话也有很大的区别。这些变化是好是坏呢?香港有人站出来批评年轻人,说他们连自己的话都不会讲,舌头怎么那么懒?还把这种现象叫做“lazy tongue”。我觉得这样的言论不太公平,没人能够阻止语言的变化,我们应当让它自然地演化。

文汇报: 是否存在一个理想的彼岸,不停演化的语言进入了成熟稳定的状态,于是不再发生任何变化?

王士元: 我一开始教语言学,经常给学生们提一个假设性问题。比如有500对夫妇,把他们丢到一个与世隔绝的荒岛上,不让其他人登岛,没有别的语言干扰。100年后,这些夫妇的语言还是原来的样子吗?这个实验没有人做过,太不人道,但有些线索可以从生活经验中找到。在任何一个家庭,祖父、父亲与儿子三代的语言不会完全一样。欧洲有学者在上世纪初做过这方面的研究,他去了深山里的一个村子,把每个家庭的成员怎么说话都记录下来,一代一代分析,然后发现彼此都有差异。有差异就意味着变化,我认为只要有人在说,语言就会一直演化下去。

文汇报: 尤其是这些年,某种语言消失或是濒临消失的新闻总是会引起关注,作为语言学家,您是什么态度?任其自生自灭还是进行必要的抢救、保存?

王士元: 我的态度是应当想办法让濒危语言保存下来,但不是采取强制措施。对于父母们来说,在有限的时间里,让孩子掌握一门主流语言,更利于未来的教育和职业的发展,这种优势是本族语言无法替代的。但我们可以呼吁当地的政府、学校、教育部门、无线电台,鼓励他们多推出一些由本族语言制作的节目或者文化产品,给族人们尤其是孩子提供自然接触和自愿学习的机会。

文汇报: 语言研究一般分为微观、中观和宏观,您比较侧重于哪一种?

王士元: 我现在关注老化问题,属于微观。当然我觉得这三个方面要兼顾,从微观的变化到中观的差异,再从中观的差异,一步一步进行推论,是否有那么一天,我们会知道原始语言是什么样子。目前来说,我们距离那一步还差得很远。

选择微观、中观还是宏观开展研究,这跟研究者的爱好有关。有一种人从小就喜欢养猫、养狗、养兔子,自然会对人的认知和动物的认知产生兴趣——两者为什么会有差异,有什么样的差异?语言是建立在认知上的,这些动物在认知上究竟缺了什么所以没有语言?另外一种人的爱好是翻书,为什么杜甫的诗里有这种词?为什么他的句法和我们现在不一样?为什么那个时候讲求押韵?几百年、几千年的变化是看得到的,我们知道如何去解释。还有一种人非常喜欢小孩,新生儿出来后一句话都不会说,躺在那里牙牙学语。他们发出的声音和将来说话有没有关系?这样的声音是否是说话的基础?如果是,最先学会的是什么词?在所有的语言里,小孩最先学的词是否都差不多,像是“爸爸”和“妈妈”?传统的研究是分析人的语言习得,我在另一头,研究语言和认知是如何消失的。

文汇报: 您一直在研究中国语言学,那么对于中国传统的语言学,您是否熟悉?

王士元: 这方面我知道的太少了,但是非常有兴趣。我念研究院的时候,经常钻在图书馆里,偶然间看到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写的一本关于《诗经》的书。三千年前的《诗经》到底讲些什么,那时的社会与现在又有什么不同?我渐渐上了瘾,看不懂就请教别人,翻翻参考书。几年前,我写了本小书,Love and War in Ancient China——Voices from the Shijing (《古代中国的爱与战:来自诗经的声音》),因为是自己的爱好,就很想写出来。文字、音韵、训诂是中国人的传统学问,不应该丢掉,中国语言学比较吃亏的一点是,我们的眼里只有汉语。几千年来,出现了很多很多种的语言,有些跟汉语很近,有些很远。如果我们要了解语言的差异和共性,就不能只顾研究自己的语言。

文汇报: 在香港,各种语言交汇,语言学研究开展得怎样?

王士元: 目前只有两个语言学系,一个在香港中文大学,

一个在香港大学。在别的学校,语言学是跟现代语言、中文合在一起办学,比如香港理工大学叫中文及双语学系。在我看来,语言学在香港并不特别突出,但因为有很多国际的接触,它的发展机会比内地多一些。但香港毕竟是个小地方,很早有了国际影响,在某些方面领先一点,将来的话,我觉得一定会是内地唱主角,这也是我的一个希望。内地的人力资源那么强,有成千上万的聪明年轻人。如果我们回顾语言学近几百年的历史,就会发现19世纪的主要阵地在欧洲,20世纪转到美国,那么进入21世纪,发展最好的或许就是中国。

文汇报: 谈谈您创办的《中国语言学报》吧。

王士元: 这是一份以中国语言学为研究对象的刊物。当时我在伯克利,琢磨着应该有这样一份学报,就去找了院长。他给了我几千美金,算是办报的经费。从1973年创立开始,很多权威的语言学家为学报工作过,担任编辑、副主编,比如李方桂先生,但他们都是无偿劳动,没有报酬。后来学报从伯克利搬到香港,打包、托运了几十个箱子,这些都是我们的一位专职员工负责,只有她是拿薪水的。起步早,又站得高,《中国语言学报》一直受到同行的认可,影响很大。

文汇报: 在伯克利时,您和赵元任、李方桂两位先生的交往多吗?

王士元: 我到伯克利后,经常会见到赵先生,去他家里吃饭。他们家住在山上,好几层的那种楼。有一次,我要用洗手间,但是找不到开关。在摸黑的时候听到角落里似乎有动静,开灯后一看,原来是两条大鱼在浴缸里游得正欢。赵太太很会做饭,家里来客人了,她就去洗手间抓鱼,这是很有趣的事。

我和赵先生经常在一起谈语言学,让我佩服的一点是他注重跨学科,对逻辑、物理都下过工夫,写过一本Language and Symbolic Systems(《语言跟符号系统》),写得蛮好的。后来退休了,他和赵太太需要有人照顾,我的学生廖秋忠就在赵家住了几年。伯克利过了桥就是旧金山,那里有很多好吃的中国馆子,每过几个礼拜,我就会开车带赵先生赵太太去下馆子。至于李方桂先生,我们见过几次面,但不是很熟悉。有人说,赵先生是“汉语研究之父”,李先生是“非汉语研究之父”,我觉得这两位都是非常值得敬佩的人物。



1979年,王士元(前排中间)应邀在北大讲授实验语音学,带来当时最前沿的学术知识和信息。